

杨少衡给自己出了一道难题

杨少衡是写经济发达地区基层干部政治生活的高手。他笔下的人物都是一些智慧型的人才——在错综复杂的条件下靠一种超常的智慧探求“执政为民”的道路。给老百姓办了好事,自己又不会被资本“拿下”,还是清清白白的一个人。这样的干部形象,只有我们这复杂的时代才特别需要,才能破解最让人头疼的“反腐”困局。不过,这一次,杨少衡栽了。在他的新作《读一个句号》(《北京文学》2011年第12期)中,他不仅无法让他笔下的主人公成为困顿专家,还让主人公把自己的生命都赔了进去。

已经接近被双规的副市长谢一鸣因一场特大火灾突然被重新起用,负责全面调查和处理火灾事件。本来,一向认为自己很清白,完全经得起任何调查的谢一鸣完全可以利用这段时间找一些关系,为自己洗刷。但他非常自信,没有这样做。他全身心地投入到工作中。在这个过程中,他终于发现由于和老市委书记、现在的副省长的特殊关系,他不可避免地要卷入一个腐败案子中来——神通广大的贺老板背着他间接地帮他解决了一些难题,而他却不得不执行有恩于他的副省长的指示,合理合法地把土地批给贺老板。他一方面在火灾案中揭露了腐败,一方面又在一个更大的腐败案中难以解脱。事实上,他完全可以按照现任市委书记的意图办案,给自己留一条后路。但他很自信,没有这样做。事态一直朝着对他很不利的方向发展。随着副省长被揭露出来许多腐败问题,自信的谢一鸣发现他就算站出来和副省长划清界线也无法说清贺老板曾经给他家人的资助与土地案无关。他清楚地知道自己不是一个腐败分子,但注定会被当做腐败分子接受组织的审查。在艰难地完成火灾案调查后,他冷静地选择结束自己的生命,作为受恩于副省长的代价。

没有办法了,只好让心爱的主人公死了,好一了百了。智慧的小说家杨少衡瞬间变得那样笨了,他找不到让主人公死不了的办法了。按照主人公那种自律与自信的个性,他是找不到出路的。社会生活的复杂性永远要挑战个人的智慧;终于会有这么一天,个人的智慧再也玩不过现实生活的复杂。谢一鸣就是这样一种个性,也就无法靠他个人的智力来破解了。他再自律,也改变不了自己的命运。作家必须尊重主人公性格发展的必然性,不可随意改变人物性格走向的结局,但又不得不面对和承认他过去很得意的“智慧”的悲剧。于是,就出现了一个难题,由于这个难题是杨少衡尊重艺术规律的独有发现,我们可以称之为“杨少衡难题”。

难题是出了,小说的主题却深化了。杨少衡以往的小说主要从人物性格中的某些优秀品质或者说支持人的本质来抵御现实的冲击,通常能获得主动。但是,当他不得不让这部小说的主人公选择死亡的时候,他显然有些悲观了。因为他发现现实的力量实在是太强大了,远远超过人性自身的道德力量。当腐败变成一片肥沃的土壤,变成一种腐朽但却深深困扰着这些基层执政者的所谓“官场文化”的时候,个人的道德力量就会变得非常可怜,变成了悲剧的助推力。小说突破一般的个人道德的格局,勇敢地直面“官场文化”对人的控制,对正常人性的扭曲,对道德的破坏。这种腐朽的文化无孔不入腐蚀改造着每一个人的观念和心灵。这是现实生活的新矛盾,新困惑。对于一个非常熟悉“官场”生活的作家来说,他的思考的深化是值得我们信任的。现在,不少人道途说,知道一点皮毛,就敢下定论,对现实说三道四,很不靠谱。杨少衡可不是这样。他对社会问题有长期深入的研究,有别人所不能启及的独到见解。所以,他对现实的描写是非常真实可靠的。就算结论还有些悲观,也不会让人误解。

坦率地说,我们不能要求作家面对一个现实的难题的时候,能马上有一个破解。他能怀疑否定自己过去设制的理念,进一步看清时代的本质,更深入思考现实的问题,不仅是他思想的进步,也是他作品的进步。《读一个句号》的“杨少衡难题”靠现有的智慧也许破解不了,但确实需要也必须靠我们时代的智慧去破解。小说主人公的命运就是强烈的呼唤。

欢迎订阅2012年《文艺报》



民间视野 传统精神

——读柳岸小说《我干娘柳司令》

□刘宏志

当下很多作家的文学书写并不是来源于生活触动,而是源于理论或者概念。而柳岸却不同,她能坚守自己最熟悉的题材领域,坚持表达生活给自己带来的切身感受,而不去追风赶潮,这就使她的写作呈现出了独特的价值。她的《我干娘柳司令》(河南文艺出版社,2011年4月出版)以翔实丰富的生活细节说明了这是一部深深植根于作家生活基础的作品。

《我干娘柳司令》在当代中国乡土叙事中,有着独特的价值,这个价值首先表现在小说叙事视角的选择上。对于乡村题材叙事,当下比较常见的处理方法有几种:一种是所谓的底层叙事,以描写乡村的破败与苦难为主旨;一种是以知识分子眼光为视角的启蒙立场叙事,主要描写以经济为先导的都市现代性文明对乡村的侵入,以及在这个过程中对乡村存在的传统文化的破坏;一种是带有主旋律意味的乡土叙事,主要描写乡村如何走向经济的富足,以及乡村怎么摆脱劣根性的桎梏。《我干娘柳司令》的叙述视角和上述几种有明显不同。《我干娘柳司令》中的叙述人是史战胜。作为一个中学老师的史战胜不是政府官员,这样,他看待问题的方式就和官方立场保持了距离,甚至对官方还有着或多或少的批判和讽刺,比如小说中对县领导推广种植苹果树的批判,对县里数位领导因为柳司令一个普通农妇的唱戏而升官的讽刺,都属此类。这样就使得小说避免了陷入主流意识形态叙事的可能。史战胜虽然只是一个知识分子,可是,这个基层知识分子思考问题的深度显然还不足以让他对文化、对国民性等问题有更为深入的思考,于是,也就使得小说避免了写成知识分子文化批判的可能。而且,史战胜是柳家集人,对当地历史、人物纠葛了

解很多,同时,他又是柳司令的干儿子,并且和干娘柳司令感情深厚。这种身份和感情使得史战胜在讲述柳司令故事的时候,更多采用了抛却任何外在的理论干涉而直指人的日常繁琐生活的民间视角。这个独特的叙述视角,使得《我干娘柳司令》脱离了上述的几种乡土叙事类型,从而具有了自己的独特性。从这个叙述视角出发,我们就可以看到一个从启蒙视角、主旋律视角,或者底层视角遮蔽下敞亮的乡村。我这么说不是强调这种民间视角的乡村变迁一定就比主旋律视角下的乡村书写或者启蒙视角下的乡村书写更有价值,问题是,当文学作品中关于乡村的想象完全被官方意识形态或者知识分子精英话语控制的时候,能够有来自民间的声音诉说农民眼中的乡村变化,显然就具有了独特的意义。所以,《我干娘柳司令》中既有老太太柳司令对文化被产业化后给他们生活带来的不便表示的愤怒,也有他们对随着经济发达而改善的生活的满足。在某种程度上,我以为,柳岸在这里是触及到了更为复杂更为多元的乡村,而不是一种理念指导下的单纯的乡村。所以,《我干娘柳司令》这部小说的一个价值就在于凭借这个民间视角脱离了种种外在理论、意识形态的桎梏,写出了更接近乡下人眼光的混沌复杂的多元乡村。这是对当下乡村叙述的一个非常有必要的补充。

柳岸对这部小说用意很深,她显然想凭借这部小说来建构一部地域文化史诗。她不仅在叙事视角上有意采用了民间视角,而且,在叙事语言上,她大量使用地方方言,在叙事的过程中,又不断加入对地方风物、民俗的介绍,她笔下的主人公柳司令,是一个非常典型的带有中原文化精神品格的老太太。当然,在对小说主人公柳

见到贾凤山的八本散文随笔集时,只能用“惊诧”来表达我彼时的心境了。这惊诧在于,实在不曾料想一位戎马一生的将军究竟于何时何地虔诚地完成他的创作,且不论成色,单这份接近执拗的固执便让些许以忙碌之名疏于动笔之人多了几分羞涩。《爱的高度》《守望乡土》《亲近自然》《心灵视觉》与书独处》《闲话日子》《追求崇高》《兵心似水》,这200多万字几乎指涉生活的方方面面,有随时随地的感怀,作者该有一颗细腻敏感的心和敏感于思考的大脑吧。

读散文,应该是最能窥见其人其心的吧。从贾凤山的散文里,读者能通过篇篇旨趣各异的文字观照出一个人的精神轨迹。他怀有一颗孩童般真的心,去面对、去体察、去状写生活。说是孩童,不见其幼稚,而是指他有探究一切新鲜的好奇,有惦念别人恩德的感激,有羁鸟恋旧林的思乡病,有横刀立马,热血报国的男儿志……不曾失却对生命和生活的温度,保有一抹清晰的生命原色,把个人的体悟与行走、阅读融为一炉,构成了个性鲜明的创作风格。写母爱,他记下母亲粗糙的双手,密密匝匝缝补的情境,偷偷拨给儿子的“大馅儿”饺子;写乡土,令人印象深刻的是土路、小河、老屋、火炕,各种野菜和树木;表达见解,毫不讳言地写下《我喜欢》《我不相信》《警惕谎言的捧杀》《“俗媚”与“雅媚”》《请别“不敢善良”》;写军人,从“我是一个兵”到老政委再到餐车上狼吞虎咽的士

兵……事事皆可入文章,无关乎重大还是琐碎,只是切入不同,意境各异,其情其心却同真。

时下的散文写作,大有无限延展、扩大之势,上下左右、四面八方似乎都可纳入散文,边界正在模糊,散文更“散”有目共睹。这8本集子中收录的文章似乎也有此特点,但最终却总能聚焦一处,所见、所思、所知、所感都由此一处发散而去。比如《亲近自然》基本是作者在路上的见闻,在这册书中读者既可以观景赏心,又可增广见闻,还可与作者对谈,推敲其思索是否恰到好处。《梦一般的凤凰古城》写了湘西古城的风情,山水、建筑、人情、风俗,再加上沈从文的文章,黄永玉的画卷,《芙蓉镇》的喟叹,让人静心潜行,触摸到原始、古朴的生命能量。《读〈平凡的世界〉》,作者直截了当地点明“我觉得最大的收获是:我感知到了生命的坚强和伟大……一个人的生活价值并不在于他的平凡或是伟大,而在于他是否能在这平凡的世界中,认真读懂属于自己的那本生活之书,并且踏踏实

司令塑造的过程中,柳岸的小说叙事主旨也一步步呈现出来——弘扬传统中原文化精神。从启蒙的眼光来看,柳司令身上同时包含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优点和劣根性。小说中的柳司令曾经是革命积极分子,甚至成了“公家人”。柳司令成了“公家人”,仅仅是因为公家的代表老陈对她很好,她就感觉受宠若惊。而在当“公家人”受阻后,她又下定决心,不再当“公家人”,甚至几十年之后还不准她儿子进大队当干部,虽然她对公家的事情一向很支持。在这里面,柳司令对公家的态度呈现出某种暧昧的色彩。这显然是由于她精神的愚昧造成的。当然,柳司令的精神局限性还不止于此,比如小说中写到的对基层政府官员的盲从、对左倾政策的盲从,等等。可是,在这部小说中,柳岸更加强调的是柳司令身上的优点:勤劳、善良而不懦弱、乐天达观、心胸豁达、坚韧、感恩、孝顺、与自然和谐。借助对柳司令这些优点的描述,作家对中原文化精神、中国传统优秀文化进行了一次弘扬。柳司令之所以能够从一个普通乡村农妇活成一个乡村传奇,很大的原因就在于她身上具有的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特质:勤劳让她身体好,并且在困难年代,在一个人拉扯几个孩子的时候生活得还不错;善良让她培育了同样善良的孩子,让她受到尊重,并且让她生活在和谐的人际关系中;不懦弱让她不必忍气吞声过日子,活得自在畅快;坚韧让她具有强悍的生命力;感恩、乐天达观让她心态平和精神放松。当小说最后描述柳司令在被埋葬之后居然还能奇迹生还,并且在各种各样的小动物的环绕下自在地放牧的时候,小说已经建构起了一个民间传奇,一个带有典型的中原文化精神特质的民间传奇。

在我看来,民间视角和传统精神是这部小说的两大支柱,借助叙述者的民间视角,小说展示了中国乡村近百年间的嬗变过程。当然,最重要的是,通过对民间视角下的柳司令生命历程的展示,小说显示了中原文化精神、中华文明的精髓所在。毫无疑问,对于当下中国来说,它非常有价值。

散文需要清新刚健之风

——谈贾凤山散文随笔创作

□早 早

实地走好属于自己的那个平凡的人生”,你大可以不认同这些观点,毕竟阅读就是个性化、私密化的体验,但在这样的散文里,却可以映照自己的感悟、建构自己的世界。

说到这套散文随笔集的语言风格,我以为梁晓声在《序》里的比喻较为贴切,他说:“像爆破兵,目标一经确定,抱着炸药包或爆破筒就冲上去了。而且,通篇文字,紧扣主题,既不拐弯抹角,也不屑于扯开去。”这一风格的确给人留下了深刻印象,贾凤山的散文随笔从不拖泥带水,常直截了当地出击且一击必中。相较于当下许多内容空泛、绕弯儿说话的作者来说,他的文章想必更适合这个快时代的读者阅读,更适合正为读书、写作惆怅不已的学生阅读。我一直觉得,“有话不肯好好说”的危害不容小觑,许多文章读来最大的问题就是皮儿太厚、馅儿太少,而现代汉语的规范、雅正也在诸如此类的文章里消失殆尽,或许现如今我们的散文更需要吹过一股清新刚健之风吧。

文艺报

WENYI BAO

《文艺报》是由中国作家协会主办的综合性文学艺术类报纸,创办于1949年9月25日,是我国文学艺术界的风向标和重要阵地。新中国以来的当代中国文艺思潮与创作动向,都在《文艺报》上有所体现。茅盾、丁玲、冯雪峰、张光年、冯牧等文学大家曾主阵《文艺报》。2012年,《文艺报》每周出版三期,每期八版。报道中国文学界的主要动态和活动,及时评论、推荐最新优秀文学作品,品评和分析影视、美术、舞台艺术等领域创作动态,在文学艺术理论方面进行深入探讨,是《文艺报》的重要特色和办报风格。《文艺报》创办有“外国文艺”、“书香中国”、“少儿文艺”、“世纪美术”、“新作品”、“经典作家”、“少数民族文艺”、“军事文艺”、“文学院”等专刊,全面报道和评介文学艺术领域的最新创作成果。《文艺报》是展现中国作家、艺术家风貌的精神家园。一份《文艺报》在手,尽享文学艺术的美妙乐章。